

論現代中國史研究之雙重意義

戴景賢

摘要

「歷史」云者，雖於今日，已屬日常語彙，溯其來歷，則係一文明概念。其成立，必要之條件，除觀看者、紀錄者與綜括者之外，亦須有一理論上構成「歷史敘述」與「歷史分析」之客觀對象；對象之設定不同，敘述之脈絡，與所附加之詮釋，乃至衍生之反省效應，亦有所差異。而在其發展之歷程中，由「族群記憶」之歷史，演變為具有「批評意識」之歷史，有一極重要之變化，即是於歷史敘述之各別對象之上，或說其背後，設定一「人類文明歷程」之概念，並以此作為「歷史敘述」之場域。此點，無論於西方與中國皆有其設置之過程。唯以實際之歷史敘述或研究而言，則因受制於不同時代有關「地理」與「文明」之知識，不僅「歷史思惟」作為一種建構「知識」之途徑，有其實質之侷限；凡學者所思考於人類之文明歷程者，其本身，亦是一隨「史學」發展而持續增擴之理解與想像。不僅如此，一切歷史之敘述，與其所能提供於後人之有關所謂「歷史事實」之說明，於進入檢閱者之內心時，亦必然受披覽當時，檢閱者心理條件與思惟所影響。因此無論「歷史」作為「歷史」之普遍意義，或「個別歷史論述」之成為一種「語言展示」之特殊意義，皆應導入一種深層之解剖：前者關於「普遍意義」者，應歸於「歷史哲學」之領域；而後者，凡涉及所謂「說明」之特殊意義者，則應劃屬「史學思想史」之範圍。現當代中國史研究之具有雙重意涵，即是於後者之論析中產生。本文以是依「現當代中國史研究之世界史意義」與「現當代中國史研究之世界史意義」，將之區分為兩重。其研究之重點，則依序畫分為4：1.現當代中國史研究之「世

2014/01/26 投稿，2014/05/30 審查通過，2014/06/03 修訂稿收件。

* 戴景賢現職為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界史」視野；2.關於歷史發展是否具有「主體之延續性」問題；3.現當代中國史研究之「中國史」意義；4.作為「國家未來」之中國與作為「文明未來」之中國。

關鍵詞：現代中國史學、中國史學史、中國史研究、中國思想史、
中國現代學術

The Twofold Meaning in Modern Historical Studies on China

Tai Ching-hsien

Abstract

What makes history become history? It involves the observer, the narrator, the interpreter, and the critics. Moreover, for the historians, it also requir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where history itself becomes the subject of observation.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history lead to different styles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 are created by different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frameworks. For the last one hundred years, two approaches have been used in the studies of Chinese history. One is to put Chinese histor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world history; the other is to view it from within the Chinese society.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and compare the two different approaches so as to evaluate their significance in the studies of Chinese history. In this way, the twofold meaning of Chinese history becomes clear in modern historical studies.

Keywords: modern Chinese studies, Chinese historiography, philosophy of history, Chinese scholarship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一、前言

「歷史」云者，雖於今日，已屬日常語彙，溯其來歷，則係一文明概念。其成立，必要之條件，除觀看者、紀錄者與詮釋者之外，亦須有一理論上構成「歷史敘述」與「歷史分析」之客觀對象；¹對象之設定不同，敘述之脈絡，與所附加之詮釋，乃至所衍生之反省效應，亦必有所差異。而於其發展之歷程中，由「族群記憶」之歷史，演變為具有「批評意識」之歷史，²有一極重要之變化，即是於歷史敘述之各別對象之上，或說其背後，設定一「人類文明歷程」之概念；並以此作為「歷史敘述」之基準。此點，無論於西方與中國，皆有其設置之過程。³唯以實際之歷史敘述或研究而

¹ 此種特殊定義之所謂「客觀」，其「客觀性」(objectivity)，有時係經由特殊之「哲學立場」設定；有時則是基於一種「歷史編纂學」(historiography)之主張而取義。至於現代哲學中，各式有關「客觀知識」(objective knowledge)是否存在？以及有關「實踐理性」(practical rationality)與「意義」(meaning)等議題之理論分析，包括「存有學」(ontology)、「認識論」(epistemology)、「心靈哲學」(the philosophy of mind)等各個不同角度之討論，參見 Paul K. Moser (1957-), *Philosophy after Objectivity*.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1993。

² 關於「歷史意識」、「歷史反思」與「歷史建構」間之關係，參見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introduction, reason in history*,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edition of Johannes Hoffmeister from Hegel papers assembled by H. B. Nisbet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中譯本，〔德〕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撰，王造時 Wang Zaoshi 譯：《歷史哲學》*Lishi zhexue* (上海 [Shanghai]: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shudian chubanshe], 2006 年)。

³ 關於中國之史學，梁任公(啟超，字卓如，1873-1929)曾有「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見梁啟超 Liang Qichao:《新史學》*Xinshixue* (1902 年)，〈中國之舊史〉“Zhongguo zhi jiushi”，編為《飲冰室文集之九》*Yinbingshi wenji zhijiu*，收於梁啟超 Liang Qichao 撰：《飲冰室合集》*Yinbingshi he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03 年重印本四刷) 第 1 冊，頁 3) 之譏。然即以《史記》為例：司馬子長(遷，西元前 145/135-前 86)之撰作《太史公書》，發明「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之體，以結合史料，完成敘述；依彼所言，其所秉持之法，除展現於所謂「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見〔漢〕Hans 司馬遷 Sima Qian 撰，〔唐〕Tang 司馬貞 Sima Zhen 索隱，〔唐〕Tang 張守節 Zhang Shoujie 正義：《史記》*Shi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2 年) 冊 10，卷 130，頁 3285-3320) 之實踐原則外，另有一學術之目標，則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語出司馬遷 Sima Qian:〈報任少卿書〉“Baorenshaoqing shu”，見〔漢〕Hans 班固 Ban gu (字孟堅，32-92) 撰，〔唐〕Tang 顏師古 Yan Shigu (字籀，581-645) 注：《漢書》*Han sh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62 年) 第 9 冊，卷 62，〈司馬遷傳〉“Sima Qian zhuan”，頁 2735；亦見〔梁〕Liang 蕭統 Xiao tong (字德施，501-531) 編，〔唐〕Tang 李善 Li shan 注：《文選》*Wen xuan* (上海 [Shanghai]:

言，則因受制於不同時代有關「地理」與「文明」之知識，不僅「歷史思惟」(historical thinking)作為一種建構「知識」(knowledge)之途徑，有其實質之侷限；⁴凡學者之從事於「思考人類文明歷程」之本身，亦是一隨「史學」發展而持續增擴之理解與想像。不僅如此，一切歷史之敘述，與其所能提供於後人之有關所謂「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s)之說明，於進入檢閱者之內心時，亦必然受披覽當時，檢閱者心理條件與思惟所影響。因此無論「歷史」作為「歷史」之普遍意義，或「個別歷史論述」之成為一種「語言展示」之特殊意義，皆應導入一種深層之考掘：前者關於「普遍意義」者，應歸於「歷史哲學」之領域；而後者，凡涉及所謂「說明」之特殊意義者，則應畫屬「史學思想史」之範圍。現代中國史研究之具有雙重意涵，⁵即是於後者之論析中產生。

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6年)第5冊，卷41，頁1865)。此一自述之語，表明於其認定中，「歷史知識」之建構，不僅在於利用各式「史料性有所差異」之史料，加以比對、整理、考證，以推求歷史之「真實」，與歷史事件之特殊性，亦在經由對於人類群體「結構形式」之變遷，乃至其中一切「功能性作用」轉化之研究，以獲得一種可以探測「人類文明極致」之視角，加深後來者對於人性之理解；雖則太史公並未企圖將整體之史學「哲學化」。此點與當時之經學家，觀點差異極大。而此一史學觀點之特質，亦顯示彼確曾於「歷史敘述」之各別對象之上，或說其背後，設定一「人類文明歷程」之概念。此其所以為「通史」之義。其精神，與日後司馬君實Sima junshi(光，號迂叟，1019-1086)之刪取各別之史以完成編年體之《資治通鑑》Zizhi tongjian(新校本，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1956年)，乃欲呈現歷經「治」、「亂」後所結構之「中國歷史」之主體，藉之以為「繼統者」鑑史之參考者，意義有別。二司馬之編纂原理，各有其學術之著眼，而皆非立足於統治者之私人立場。即其作品，或其作品之仿效，於日後或當時，能產生支撐統治者「政治正當性」(political legitimacy)之作用，亦非可選以「家譜」視之。梁氏之說，欲揚新而不惜棄舊如此，正顯示當時學者之一種急切而不免於浮躁之心態。

⁴ 有關「歷史」觀念之變衍，參見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1889-1943),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中譯本，〔英〕柯林烏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撰，陳明福 Chen Mingfu 譯：《歷史的理念》Lishi de linian (臺北[Taipei]：桂冠圖書公司[Guiguan tushu gongsi]，1992年)。

⁵ 關於「現代」一詞之中國史意涵，參見拙作〈中國現代學術之形成與其發展脈絡〉“Zhongguo xiandai xueshu zhi xingcheng yu qi fazhan moluo”(收入戴景賢 Tai Chinghsien：《中國現代學術思想史論集》Zhongguo xiandai xueshu sixiang shi lunji (香港[Hong Kong]：中文大學出版社[Zhongwen daxue chubanshe]，2014年，排印中)，〈導言〉“Daoyan”)。

二、現代中國史研究之「世界史」視野

歷史研究中，「早期近代」(early modern) 以來之所謂「世界史」(world history) 之視野，就哲學而言，雖是建立於一種普遍理論，究論其實，其核心之研究基礎，則是奠立於西方對於所謂「現代」(the modern era) 之理解；以此期待以「哲學觀點」，⁶乃至「社會學之社會結構理論」(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social structure)，⁷或「歷史形態學」(morphological study of history)⁸之方法，詮釋人類文明之發展。因而就長遠之觀點而言，以現有之觀點，對於歷史現象作出「基本性質」或「形態性質」之判斷，與根據特殊個案事例之研究，返回立論之本初，修正現有之詮釋理論，或增添理論之內涵，皆屬可能。就中國史而言，由於其所積累於文明之豐富性與獨特性，進入「世界史」研究之議題，並取得一種詮釋性之判斷，不僅考驗以「歐洲文明」為研究基礎之世界史觀點之正確性；亦於實際上，擴大「世界史」之詮釋範圍。

然一種「世界史」之視野，運用於個案之研究，基本之困難點，皆在於「議題之連結」。錯誤之連結，必將導致錯誤之詮釋；而粗疏之連結，亦可能導致「似是而非」之結果。因而任何一種研究，對於複雜之歷史現象

⁶ 關於西方學術史中以「哲學思惟」(philosophical thinking) 看待歷史之各種類型，參見 Robert M. Burns and Hugh Rayment-Pickard eds., *Philosophies of History: From Enlightenment to Post-Modernity*.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中譯本，〔英〕伯恩斯 Robert M. Burns、皮卡德 Hugh Rayment-Pickard 輯，張羽佳 Zhang yujia 譯：《歷史哲學：從啟蒙到後現代性》*Lshi zhexue : Cong qimeng dao xiandai* (北京[Beijing]：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Beiji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08 年)。

⁷ 關於「歷史學」與「社會理論」間之關連，參見 Peter Burk (1937-),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1993)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中譯本，〔英〕彼得·伯克 Peter Burk 撰，姚朋 Yao peng、周玉鵬 Zhou Yupeng 譯，劉北成 Liu Beicheng 校：《歷史學與社會理論》*Lishixue yu shehui lilun* (上海[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2001 年)。

⁸ 「形態學」之歷史研究法，有一著例，即史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 1880-1936 之《西方之沒落》。而其書之副標題，則為「世界史之形態學大綱」(參見 Oswald Spengler,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Umrisse einer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 (1918-1922)；*The Decline of the West*, 2 vols., authorized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 by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1880-1960),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32。中譯本，〔德〕史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 撰，陳曉林 Chen Xiaolin (1949-) 譯：《西方的沒落》*Xifang de moluo*，臺北[Taipei]：遠流出版公司[Yuanliu chuban gongsi]，2000 年 2 版 3 刷，據 1962 年單冊節本譯)；〔德〕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 撰，吳瓊 Wu qiong 譯，《西方的沒落》*Xifang de moluo*〔全 2 卷〕(上海[Shanghai]：上海三聯書店[Shanghai sanlian shudian]，2006 年)。

而言，皆屬一種嘗試。現代關於中國個案之研究，充滿不確定性，即是由此引生。

第一項應確認而難於確認者，在於一般史中之「階段論」分期問題。⁹此項工作之是否能予以確認，一方面牽涉整體「世界史詮釋」於中國史之適用；另一方面，亦可能導致對於長期以來世界史「階段論分期標準」之修正。亦即：如「中國史」無法以歐洲史中現有之「三階段論」予以適當分期，則見所謂「古典時期」、「中古時期」與「近代」之於歐洲史呈現為三階段，僅是人類社會各種發展因素，於特殊之功能變化中，所帶動之一種結構變遷；人類社會由「古典」以迄「近代」，並無一「形態演化」上之必然。

然如「中國史」能以歐洲史中現有之「三階段論」，加以分期，則見所謂三階段論，並非僅於歐洲史適用；亦係人類社會，由「新石器時代」（Neolithic Era）後期，進入「高等文明」後之一種軌跡之必然。而所謂「各種發展因素，於特殊之功能變化中所帶動之結構變遷」，各階段間，實皆應存在具有「決定性」作用之發展原理；不論此項原理，為持續一貫，或於其過程亦有轉換。至於此具「決定性」作用之發展原理，究竟為一種「決定論（determinism）式的」，或「功能論（functionalism）式的」，則牽涉相關之「歷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或「社會史」（social history）理論；論者間不必抱持相同之立場。

大致而言，增入「世界史」之視野，既於現代以來之中國史研究為應有與必有，則於其逐漸成熟之階段，採取「普遍」義之「三階段論」以為嘗試，自屬必然。¹⁰問題僅在於「三階段」之分段，究應落於何處？其畫分之標準為何？

⁹ 所謂一般史中之「階段論」分期，因具有「社會演化」之相應，故具有「世界史」之意義。日本學者內藤湖南（1866-1934）之「東洋史分期」，即是先立基於世界史之「階段論」，然後始於東洋史之「近世」，作出界定。此種「階段分期」，與中國傳統史學中所謂「斷代為史」之建構「朝代史」，自是迥不相侔。至於本於馬列主義而主張之「五階段論」（參見 Joseph V. Stalin (1878-1953),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938)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2，則是另一種具有「歷史唯物主義」性質之分期法。論詳艾思奇 Ai Siqi（原名李生萱 Li Shengxuan, 1910-1966年）主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Bianzheng weiwu zhuyi lishi weiwu zhuyi*（北京[Beijing]：人民出版社[Renmin chubanshe]，1961年）。

¹⁰ 至於西方史學於清末之傳播，及此一過程所受日本學界之影響，參見李孝遷 Li Xiaoqian：《西方史學在中國的傳播（1882-1949）》*Xifang shixue zai zhongguo de chuanbo*（1882-1949）

對於以「功能論」為主要觀察依據之學者而言，其困擾在於：歐洲之「中古史」(history of Middle Ages/ Medieval History)，具有豐富之多樣性，局部而觀，其樣態常出現於不同時期之中國；而中國則並無一確定之時期，其特徵與歐洲之「中古」高度相似。因此如堅持「直線演化」(unilinear evolution)之理論，¹¹而學者又無法於短時間內獲得一致之結論，即可能使此一詮釋之方法，降低其說服力。

相對於此，另一種以「經濟支配理論」與「社會衝突理論」為著眼，而進行之足以結合「經濟」、「政治」與「意識形態」(ideology)於一之批判性學說，如馬列主義(Marxism-Leninism)，即有相對之優勢。今若綜觀其說而予以析論，彼之所以於當時中國之「社會史」詮釋與爭議中，逐步取得進展，其原由可歸約為五：

原因之一，在於其「理論形態」之屬於「決定論」，因而於其論述中，一切對於社會產生影響之因素，皆有一種「相互關連」之論述；且其關係可以確認。此點對於日趨複雜而混亂之「中國史論」而言，具有「導引性」。

原因之二，在其理論中，「結構」(structure)與「功能」(function)間之關係，係連繫於歷史之「辯證性推展」(dialectical development)，其邏輯為抽象而嚴格。此點使其史論，對於演繹其說者而言，乃屬一種「探尋」之方法，而非一種「綜括」與「歸納」之手段；因而能於初期產生令人感覺「考掘出新知」之效果。

原因之三，在其理論中，歷史階段之演進，係透過「顛覆性」之衝突而達成；此點符合當時國人「期待革命」之心理。

原因之四，在其理論中，一切舊制度之顯見為腐朽與頑固，皆屬形勢推移下之必然；此點解答當時國人對於中國何以長期落後之困惑。

原因之五，在其理論落實於討論經濟基礎之上層建構物時，事實上發展出一套靈活而完整之屬於「意識形態」概念之運用策略。此點方便於簡化中國史中最為複雜之屬於「社會史」(social history)研究應如何與「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相互關連之問題。批判中國傳統之哲學思想、

(上海[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07年)。

¹¹ 反對此種將「社會演化」與「歷史演化」比附於一種「直生論」(orthogenesis)式之生物演化論，20世紀前半有一重要之批判，即是來自鮑亞士(Franz Boas, 1858-1942)之人類學研究。

政治思想、社會思想與宗教思想，對於詮釋者而言，皆若可以「得一而御眾」。¹²

唯對於「馬克思主義」(Marxism)之世界史研究而言，其理論之運用，仍有一未十分明晰之點，在於：世界史之發展，是否於歐洲路徑之外，尚存在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與「亞細亞社會」(Asiatic societies)？此點關係重大。

蓋若此一原本即已存在於馬克思(Marx)學說中之概念，可透過俄羅斯與中國之歷史研究，而予以擴充；則此一分裂性之說明，即可能導致對於俄羅斯結合「農民」而革命之史實之重新詮釋。且就理論之構成而言，「辯證法」(dialectics)本身，即是一種「內部」理論；允許「兩條路線」，即是承認人類於其社會建構之最初始，即可能發展出不可逆轉之分歧。若然，則不僅「普遍」義之「世界史階段論」，無法建構；「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之說，亦將破產。¹³故此事最終由史大林主導之1931年列寧格勒會議中作出裁決，將所謂「亞細亞社會」，定位為僅是「古典社會」之變型。中國於此方面之討論，雖未因此終止，然大體亦受到明顯之導引。¹⁴

¹² 「得一而御眾」，借王輔嗣(弼，226-249)語。輔嗣云：「自統而尋之，物雖眾，則知可以執一御也。」見王弼 Wang bi:〈周易略例〉“Zhouyi lueli”，收入〔魏〕Wei 王弼 Wang bi 撰，樓宇烈 Lou Yulie (1934-) 校釋：《王弼集校釋》Wang bi ji xiaoshi (北京[Beijing]: 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2009年四刷) 下冊，頁591。

¹³ 此一問題之明顯化，係由1928年蘇聯中國問題研究所出版之馬扎亞爾(L. Madyar)《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一書有關中國仍存留「亞細亞生產方式」之觀點所引發。參見〔匈〕馬扎亞爾(L. Madyar)撰，陳代青 Chen Daiqing、彭桂秋 Peng Guiqiu 譯：《中國農村經濟研究》Zhongguo nongcun jingji yanjiu (上海[Shanghai]: 神州國光社[Shenzhou guoguang she], 1930年); 李勇 Li Yong:〈「中國社會史論戰」對於唯物史觀的傳播〉“Zhongguo shehui shi lunzhan’ duiyu weiwu shiguan de chuanbo”,《史學月刊》Shixue yuekan 2004年第12期。

¹⁴ 如侯外廬(原名兆麟，又名玉樞，1903-1987)於20世紀30、40年代，研究「中國古典社會」，主張世界史之「古代」，確有不同路徑，且謂「古典的古代」與「亞細亞古代」二者，亦無必然之先後；然於其說中，不免仍將之皆歸屬於奴隸社會，謂有此兩型，一由「革命」，一由「改良」，即是一例。說見侯外廬 Hou Wailu 撰：《中國古典社會史論》Zhongguo gudian shehuishi lun (1941)(重慶[Zhongqing]: 五十年代出版社[Wushi niandai chubanshe], 1943年; 本書於1946年修訂再版時，改題為《中國古代社會史》Zhongguo gudai shehui shi。杜國庠 Du Guoxiang 校閱版，侯外廬 Hou Wailu 撰，中國學術研究所 Zhongguo xueshu yanjiusuo 編輯：《中國古代社會史》Zhongguo gudai shehuishi, 上海[Shanghai]: 新知書店[Xinzhishi shudian], 1948年)。關於侯外廬研究馬克思理論之歷程，參見杜運輝 Du Yunhui:《侯外廬先生學譜》Hou Wailu xiansheng xuepu (北京[Beijing]: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13年)

雖則如此，「亞細亞生產方式」與「亞細亞社會」之於共產革命成功後，由學者引發討論，乃至最終定性為所謂「變型」之說，仍給予「中國史」之社會史研究，以一種重要之指引；即是：必須看重中國「土地」與「人口」關係之特殊性。此一趨向，不僅驅動後續有關「中國社會史」之研究，亦揭露出大量前此未曾注意之歷史面相與議題。此一影響，於今日馬克思史學已逐漸喪失其支配力後，仍有若干延續。

馬克思主義之世界史研究，其理論之運用，另有一項困難之點，即是「普遍性」與「特殊性」間之內在關連，難於確定。因如一種歷史理論對於社會發展之各階段，其所標示之「普遍性」與「特殊性」，僅是就「發生之事實」加以歸納，則其所得之結果，必仍止是依據「現象」而有之描繪與判斷；並無法證明凡此種種，皆來自同一種「客觀之規律」。除非建構此一「特殊性」特質之來源，本身即是「普遍性」之一種「實現」(act)。故說明其為「特殊」，同時即須說明其何以同時即是「普遍」。依此而論，不僅「中國史」研究之適應「歐洲史詮釋模型」，須證明其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連結；即歐洲之類型，亦須於其表現為「普遍性」之特質外，說明其所以具有若干不可複製之「特殊性」之原由。由是而推衍，馬克思史學所推動之「中國史」之世界史詮釋，實際已不全依歐洲史之分期模式，而是逐漸建立起其自身特殊之分法。

此所謂「特殊之分法」，重點有三：第一項，即確認中國確曾出現嚴格義之「奴隸制社會」，問題僅在於：由「氏族制社會」進入「奴隸制社會」之時刻為何？第二項，則是依中國自身之歷史，確認「中國封建制社會」之基本特質與鑑定標準；並判斷中國由「奴隸制社會」進入「封建制社會」之分期點。第三項，則是以正式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之發展期，為中國進入「近代」之開始；然亦於同時推究「早期資本主義」於中國之萌芽。

上述研究，如暫置其所帶動之議題與相關之研究成效不論，其所可能引生之「合理性」質疑，在於：依其立論之所據為判斷，中國無論由「氏族制社會」進入「奴隸制社會」之時刻為殷末，或周初；亦無論中國由「奴隸制社會」進入「封建制社會」之時刻為春秋或何時，皆顯示一種文明形態之「早熟」。然中國由「封建制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期」之時刻，顯然又極晚；顯示一種「遲滯」。此種或早或晚之情況，如遵照馬列之經典理論為說，必須有屬於「結構」而非「功能」之原因；否則難以解釋。

如順此理路，可能之發展，有二：一種即繼續沿用「亞細亞生產方式」與「亞細亞社會」之概念，將之提出，作為詮釋「中國形態」之所以「非標準」之結構成因；另一種，則是將原本屬於「功能」之因素，深化解釋為「影響結構發展」之因素。

對於第一種方式而言，事實上，必須重啟有關「亞細亞生產方式」之討論；並由此充實所謂「亞細亞社會」之形態內涵。¹⁵對於第二種而言，如「功能」因素，確實能深化解釋為「影響結構發展」之因素，則一種「特殊性」之存在，於理論上，必將允許其它「特殊性」存在之可能。若然，則依此延續而發展之馬克思主義史學，雖可能維持其「社會衝突理論」(theory of social conflict)之本質，乃至一種「辯證法式之邏輯」；就其真實面而言，已非一種普遍義之「決定論」。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史學之此種運用，顯現為僅是一種研究世界史之方法，而非一種解釋世界史之理論。

相對於「決定論」之嘗試，無論其為何種，另一類概略式之構想，則以「秦漢史」為古典之帝國時期，而以漢帝國之某一時刻，及其後之崩解，或漢帝國之正式結束，作為中國「中古時期」之開始；至於「中古」之進入「近代」，則由中國接受西方之衝擊，而逐漸進行「現代化」(modernization)之時間起算。其前皆為「中古」。

此一說法，由於具有較明顯之可與「歐洲史」相類比之特性，故大致成為「階段分期論」發展時期，非馬克思主義之史學家，逐步將細部之「社會史」概念與議題，帶入「中國史研究」之導引。中國史中有關「人口性質」、「社會組織」，乃至「經濟結構」等之討論，由是成為以「功能論」為方式，證實「三階段論」之重要依據。「中國史」之現代詮釋，開始展現另一種具體之「世界史研究」之意義。

然此種屬於「功能論」之階段論分期法，亦有其論述上之困難。首先在於：中國史之「中古形態」，是否亦能以「型態化」之歐洲中古之「封建體制」(feudalism)及其屬性，¹⁶作為「分析」之工具，從而得出屬於「功

¹⁵ 如魯之凡 Lu Zhifan (周魯逸, 1948-):《東方專制論：亞細亞生產模式研究》*Dongfang zhuanzhi lun: yaxiya shengchan moshi yanjiu* (臺北[Taipei]: 南方叢書出版社[Nanfang congshu chubanshe], 1987年), 即是欲將「亞細亞生產方式」之討論, 還原成為「世界史論述」之另一種可能; 並於中國之事例, 歸納出所謂「中國生產方式」與「中國發展形態」。

¹⁶ 關於歐洲中古封建體制中依附關係之成長, 乃至社會等級、政治體制之基本特徵, 參見 Marc Léopold Benjamin Bloch (1886-1944), *La Société Féodale*, two volumes, translated by

能論」之類比？而此中國方式之中古社會，其核心特質，乃至綿延之形態，又應如何加以說明？

此點時至今日，雖仍屬史學界所討論；然對於「非決定論者」而言，已因議題之複雜，使「詮釋之觀點」逐漸分散，從而亦令此一時期之「分段」意義，隨之產生變化。「一般性之中古」與「特殊性之中古」，此二項看似對立之概念，並非不可於「個案之研究」中相互結合。問題僅存留於：中國史何時進入「近代」？此一未能充分解決之議題。¹⁷

其次之困難點，在於：所謂歷史之階段論分期，如關鍵點，繫於社會之結構形態，由此而得出「必然」之結論，而非僅是一般義之「類比」；則形態之由「結構」展現，其形成與變遷，諸多因素之中，必有一、二項，較之其它各項，更具支配力，從而使一切「組織」與「功能」，偕同而為一體之「演化」。因此，所謂「演化」之觀點如須維持，而非止是說之為「變衍」，究竟應以單純之「社會經濟史」為論述之基礎，或應建構一種「綜合之功能論」？此點亦應加以分析。¹⁸

第三項困難點，則是：凡此種立基於「演化」概念之討論，對於「中國史」研究而言，其優點在於「分析角度」與「議題」之增添；缺點則是無論「功能論式」或「衝突理論式」，皆可能產生「理論」導引「研究」

L.A. Manyon, *Feudal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中譯本，〔法〕馬克·布洛赫 Marc Léopold Benjamin Bloch 撰，張緒山 Zhang Xushan、李增洪 Li Zenghong、侯樹棟 Hou Shudong 等譯：《封建社會》*Fengjian shehui*（北京[Beijing]：商務印書館[Shangwu yinshu guan]，2012年）。關於布洛赫與法國年鑑派史學之相關說明，參見 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89*. St. Redwood C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¹⁷ 關於「封建」一詞於現代中國史研究之名實問題，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Zhongguo shehui kexue yuan lishi yanjiu suo、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Zhongguo shehui kexue yuan jingji yanjiu suo、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歷史研究》編輯部 Zhongguo shehui kexue zazhi she *Lishi yanjiu bianji bu* 合編：《封建名實問題討論文集》*Fengjian mingshi wenti taolun wenji*（南京[Nanjing]：江蘇人民出版社[Jiangsu renmin chubanshe]，2008年）。

¹⁸ 如較早期嚴又陵（復，字幾道，1854-1921）所譯介斯賓賽（Herbert Spencer, 1820-1893）有關「演化」之社會學理論（Herbert Spencer, *The Study of Sociology*.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1；中譯本，〔英〕斯賓賽 Herbert Spencer 撰，嚴復 Yan fu 譯：《群學肄言》*Qunxue yiyen*（北京[Beijing]：商務印書館[Shangwu yinshu guan]，1981年）），即是一以「非連貫之同質」以達致「連貫之異質」之「積累漸變」說。參見 Peter Burk（1937-），*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Ch.5, p.142-151；中譯本，〔英〕彼得·伯克 Peter Burk 撰，姚朋 Yao peng、周玉鵬 Zhou Yupeng 譯，劉北成 Liu Beicheng 校：《歷史學與社會理論》第5章，頁168-178。

之偏蔽。特「功能論式」所產生之導引，因無政治力加以操作，故較不明顯。¹⁹

以上兩類以全然之「社會學理論」主導之歷史研究，除上述之困難，與所可能產生之「詮釋扭曲」之外，另一明顯之缺陷，即是：此類研究，將大幅度輕估「價值理念」所可能產生之對於歷史之影響。此一缺陷之於史學中之「功能論」或「社會衝突理論」中普遍存在，主要因「價值觀」之表現於不同文化、不同社會、不同時代，其作用與表現形式，皆有所不同；因此其研究，難於「一般化」與「理論化」。故無論以「思想史」之研究作為補充，或徑以「意識形態」之理論為之概括，皆無法正確予以衡量。然而對於「中國史」之研究而言，有一可採取之挽救措施，即是增強有關中國史上「智識份子」(intellectuals)與「智識階層」(intellectual stratum)之研究。²⁰

此一研究角度之出現，主要來自中國傳統上對於廣義之「智識份子」之影響力之重視，而嘗試於其間，增添一種「社會功能」與「社會結構」之分析眼光。此種分析，由於並非直接以「社會學」現成之理論套接，故

¹⁹ 關於一般性之「歷史主義」乃至「歷史運命論」之方法學缺失，參見 Karl Raimund Popper (1902-1994),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7. 中譯本，〔英〕波普爾 Karl Raimund Popper 撰，李豐斌 Li Fengbin 譯：《歷史定論主義的窮困》*Lishi dinglun zhuyi de qiongkun* (臺北[Taipei]: 聯經出版[Lianjing chuban], 1981年); 卡爾·波普爾 Karl Raimund Popper 撰，何林 He Lin、趙平 Zhao Pin 譯：《歷史主義貧困論》*Lishi zhuyi pinkun lun* (北京[Beijing]: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1998年)。

²⁰ 一種以「價值觀」與「功能說」為基礎之「文化形態論」研究，可以錢賓四(穆，1895-1990)之《文化學大義》*Wenhua xue dayi* (收入錢穆 Qian Mu 撰，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Qian Binsi xiansheng quanji bianji weiyuanhui 主編：《錢賓四先生全集》*Qian Binsi xiansheng quanji* (臺北[Taipei]: 聯經出版[Lianjing chuban], 1998年)第37冊)、《民族與文化》*Minzu yu wenhua* (同上)，與《國史新論》*Guoshi xinlun* (同上，第30冊)等著作為代表。參見拙作：〈論錢賓四先生「中國文化特質」說之形成與其內涵〉“Lun Qian Binsi xiansheng ‘zhongguo wenhua tezhi’ shuo zhi xingcheng yu qi neihan” (收於戴景賢 Tai Chingsien: 《錢賓四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Qian Binsi xiansheng yu xiandai zhongguo xueshu* (香港[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Hong Ko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2014年)頁197-231)。另一種，則是以嚴格之社會史、思想史為基礎之「智識階層史」研究，重要之著作，則有旅美學界余英時 Yu Yingshi 先生所撰作之《士與中國文化》*Shi yu zhongguo wenhua* (1987) (上海[Shanghai]: 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2013年第2版)與《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Zhongguo zhishiren zhi shi de kaocha* (桂林[Guilin]: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04年)等書。

具有一種「非理論性」之探討功能。中國社會之特殊性，於此種取徑中，獲得凸顯。

以此而延伸，如中國之智識份子，與其階層化之後所形成之效應，反映於社會結構與功能，足以產生特殊之作用力，不同於歐洲歷史；如同歐洲基督宗教及教會之發展，所產生之特殊社會現象，亦未見於亞洲各國。則所謂「中國史」之歷程，是否亦可有所不同？而所謂「三段論式」之畫分，於此狀況下，是否仍具有普遍性？即有討論之價值。

一種意見，認為中國智識份子所具有之精神特質，與其階層化後之發展，與中國政治體系所建構之關係，及其所產生之效應，足以使中國史走向特殊之途徑衍變；中國史中出現可與歐洲史類比之現象，止能為「局部的」與「階段的」，而非「整體的」與「全歷程的」。中國史之演進，有其自身之脈絡與節奏。²¹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此項特殊性，雖不能使「中國史」脫離世界史之進程，卻可使中國史之三階段，有其獨特之演進方式。

前一種意見，係於本質上，推翻歷史之普遍義之「演化論」概念，因此必然將使所謂「世界史」之概念，由「全體的」與「共同的」，分裂為「民族的」與「各別的」。「世界史」之最終發展，即使因互動而造成彼此間之影響而形成一種觀看之新視野，依此觀點，各民族或各式「社會共同體」自身之發展脈絡，亦不因此而消失。所謂「世界史」，於其理解中，除為一種「知識上之綜合說明」外，亦必將止為一基於「全球化互動」所造成之事實之結果；而無超越於此之上之深層意義。

後一種意見，困難點則在於：研究者無從鑑識中國智識份子所具有之精神特質，與其階層化後與中國政治體系所建構之關係，其終極之影響力如何？亦無從說明，所謂「中國史」，最終仍無從脫離「世界史」之演化規律之基本原因何在？

²¹ 此一意見最具代表性之觀點，來自錢師賓四；論詳拙作〈錢賓四先生所關注之時代問題與其學術取徑〉“Qian Binsi xiansheng suo guanzhu zhi shidai wenti yu qi xueshu qujing”、〈論錢賓四先生「中國文化特質」說之形成與其內涵〉“Lun Qian Binsi xiansheng ‘zhongguo wenhua tezhi shuo’ zhi xingcheng yu qi neihan”、〈錢賓四先生有關歷史與人性之理解及其學術意義〉“Qian Binsi xiansheng you guan lishi yu renxing zhi lijie ji qi xueshu yiyi”、〈錢賓四先生研究歷史之角度與其建構史觀之過程及方式〉“Qian Binsi xiansheng yanjiu lishi zhi jiaodu yu qi jiangou shiguan zhi guocheng ji fangshi”，收於戴景賢 Tai Chinghsien：《錢賓四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Qian Binsi xiansheng yu xiandai zhongguo xueshu*，頁 59-196、197-231、275-322、323-361 諸文。

除「階段分期論」之歷史詮釋外，「世界史」視野之引進於「中國史」研究，另有一明顯之效應，則是促使「歷史研究」與「考古學」(archeology)、「人類學」(anthropology)相互接軌。

對於中國研究而言，此項接軌，不僅使中國之人種起源、文明起源與國家起源，建構嶄新之詮釋脈絡；亦使學者對於作為「中國文明」重要基礎之學術、思想，與其所產生之社會影響，能增添一種屬於「人類學」之研究向度；²²而非僅是一種傳統性質之「義理」或「哲學」之解析。

此種「人類學」研究向度之增添，於學術、思想之研究，其價值，不僅在於「起源論」與「基礎論」；亦在可藉由比較「價值理念」肇生與深化之途徑，深入思索「人性發展」與「文明形式」間之關連。

三、關於歷史發展是否具有「主體之延續性」問題

以上所述，為現代學者以「世界史」之視野，面對「中國史」之個案研究時，所運用之觀點與方法；此一改變，不僅使「中國史」之研究，成為「世界史」之一部分，對於中國本身之學術發展而言，亦係一具有決定性影響之因素。然以中國之現實而言，中國本身作為一「文化體」之延續，此一於現代重新確認之事實，卻使此種「世界史」之新觀點研究，對於中國人而言，具有另一重不同於「世界史」層面之意義。

相對於僅從「世界史」之視角觀看中國，中國人亦開始尋求「中國」位於「世界」中之位置。此一具有主觀需求之強烈企圖，反映出中國於「現代化」(modernization)之社會轉化過程中，並未改變自來以「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作為其「文明意識」(cultural consciousness)之傳統。不僅如此，由於新視野之增入，中國學者於批判中國歷史之同時，亦逐步反省一項深邃之議題，即：歷史之發展，對於具有悠長「歷史記憶」與自主性之民族而言，是否於其歷史事實之背後，尚存在一富於特殊意義之「發展主體」？此一「主體」，如若存在，究竟係一「社會主體」？「國家主體」？或乃一具有「歷史性」意義之「文化主體」？此一主體，於各

²² 此種兼有「人類學」性質之研究向度，有屬於「學術」與「思想」之起源問題，亦有屬於二者之發展屬性問題；參見拙作：《程學閣著作集》Chengxue ge zhuzuo ji 第6種《中國學術概念產生之歷史時刻與其條件》Zhongguo xueshu gainian chansheng zhi lishi shikey u qi tiaojian (待刊)一書所收各文。

階段之發展時，其所憑藉以「推動」之力及其來源，是否皆屬一致？²³而所謂「歷史之詮釋」，對於該民族而言，是否亦可能於理解「世界史」之同時，存在一種建構於「歷史主體」概念之上之另類詮釋；且將此種詮釋，脫離於「世界史」之脈絡？

對於期待中國「全盤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 或完成「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 之學者而言，其起念之初衷，本即是站立於「世界史」之角度；且此角度為唯一。故所謂「全盤西化」或「文化革命」，其背後進行此一變革之主體，於理念上，非屬「國家主體」，即是「社會主體」；而必不為「歷史性之文化主體」。因對於持此種觀點之學者而言，「文化」僅應為一歷史累積之狀態，其自身即使以「社會建構」之方式形成「主體」，亦並無何不可更替之「延續性」。

然中國持續「現代化」之進程，卻使「中國社會特殊性」之議題，逐漸浮現。此一「中國社會特殊性」，如僅是一「未完全轉化」之事實之結果，而非無法完全轉化；則作為轉化之主體者，於轉化後，有二種可能：一種可能，即是中國不再維持統一。於此狀況，分裂後之「前中國」地區，「社會主體」、「國家主體」，皆將走向多元。另一種可能，即是中國維持統一。於此狀況，不分裂之「中國」，「國家主體」與「社會主體」，是否終極合一？則或然、或不然。而作為統一形式之支撐者，皆為「國家主體」。

唯若中國之「國家」與「社會」，於達成其所設定之「現代化」目標之過程中，始終必須因應「中國社會之特殊性」，無論「國家主體」與「社會主體」之結合狀態為何；且此問題延續。則無論分、合，或合後分、分後合，皆可能引起歷史之詮釋者，對於「文化」是否僅為一「歷史累積之狀態」之重新思考。

對於「世界史」之研究角度而言，中國之發展，無法長遠預測；亦無須預測。因此，「中國社會特殊性」之延長，無法顯露其真正意義；除非中國之發展，最終改變或限縮，社會學與「文化批評論述」中有關「現代性」(modernity) 之基本定義。

²³ 最近之一種新詮釋，企圖將 20 世紀最終 30 年所持續熱絡之「全球化」(globalization) 現象，「概念化」成為觀察世界史之角度，以構成所謂「全球史」(global history)。於此類綜括之說明中，其所條理之重點，多在各區域、各實體間之「互動」，而非其各自之發展；因而所注意之「推動力」，亦僅是發生於「各個影響因素之間的」，而非「社會內部的」。

然如僅以「中國史」為思考主軸，此類學者，卻可能尋求另一種歷史詮釋，即是：中國如最終完成其「現代化」之目標，且能以此方式繼續發展；則所謂「現代化」與「現代性之追求」，²⁴對於中國而言，即是可以分裂之概念。中國之未來，無論構成其「社會意識」之組成成分為如何多元，皆可謂乃是因此一「延續性文化主體」之存在，而使其維繫成為一可「融合歧異」之整體。

此項思惟一旦產生，隨之必將引起之討論，即是：以「文化體」為著眼，詮釋具有「整體性」之社會，本即是「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 經常運用之方法，「社會」(society) 之概念本身，亦本涵攝一定程度之「主體」與「主體性」(subjectivity) 之概念在內；則強調「文化體」之具有某種「歷史之延續性」，其所增添於「文化體」之意涵，究竟落實於何處？

²⁴ 以「思想史」、「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 結合於「一般史」之綜合分析，以探討現代中國智識份子對於西方「現代性」之追求，及此項追求，於「心態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 / *histoire des mentalités*) 上之意義，開創之研究事例，為李歐梵 (Lee Oufan, 1942-) (參見 Lee Oufan,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李歐梵 Lee Oufan: 《現代性的追求：李歐梵文化評論精選集》*Xiandaixing de zhuiqiu: Li Oufan wenhua pinglun jingxuan ji* [臺北[Taipei]: 麥田出版公司 [Maitian chuban gongsi], 1996 年]) 同時持類似之概念，而之以解析晚清小說及現代文學者，則有王德威 (1954-) (參見 Wang Derwei, *Fin-de-Sie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中譯本，王德威 Wang Derwei 撰，宋偉杰 Song Weijie 譯：《現代性的壓抑：晚清小說新論》*Xiandaixing de yayi: wanqing xiaoshuo xinlun* [臺北[Taipei]: 麥田出版公司 [Maitian chuban gongsi], 2003 年)。王德威 Wang Derwei: 《眾聲喧嘩》*Zhong sheng xuanhua* [臺北[Taipei]: 遠流出版公司 [Yuanliu chuban gongsi], 1988 年)。至於另一種可稱之為「庸俗化」後之「現代性」觀念，則是卜正民 Timothy Brook 於討論中國現代「歷史書寫」時所歸納、指稱之所謂「以『超越過去』為核心定義」之思想表現 (參見卜正民 Timothy Brook: 〈資本主義與中國的現代歷史書寫〉“Ziben zhuyi yu zhongguo de xiandai lishi shuxie”，收入卜正民 Timothy Brook、格力高利·布魯 Gregory Blue 主編，古偉瀛 Gu Weiying 等譯：《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Zhongguo yu lishi ziben zhuyi* (北京[Beijing]: 新星出版社 [Xinxing chubanshe], 2005 年))。此種現實思惟，與真正屬於「現代性之追求」者，雖非無關連，並非一事。除以上兩類形態之外，尚有一種亦名之為「現代性語境分析」之論述，彼所謂「現代性」，不僅與社會學、哲學無關，亦非一種文化評論；而是以研究者個人之認知，於中國現代思惟之轉變中，設定議題，加以討論。如鄭家建之以「空間性知覺方式之變遷」為說明者 (見鄭家建 Zheng Jiajian [1969-]: 《中國文學現代性的起源語境》*Zhongguo wenxue xiandaixing de qi yuan yujing* [上海[Shanghai]: 上海三聯書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2002 年])，即是。

回應此一質疑，首先須釐清之要點，在於「社會」概念本身所涵攝之「主體」與「主體性」之意涵，與具有文化延續性之「歷史主體」之「主體」與「主體性」意涵，二者間之差異。

此項差異，究實而論，即在於歷史之延續性。蓋所謂「具有文化延續性之歷史主體」，其在「現實」之層面，本即是一社會主體；然自另一端言，成為一社會之主體，卻並不必然於歷史之歷程，建構文化之延續性，且時時以之影響歷史發展之走向。此一分別，若深言之，可藉英國哲學家波普爾²⁵之「意向性」(intentionality)概念，予以解釋。

所謂「意向性」之概念，主旨在於針對「測不準原理」成說後，所出現之應如何面對「概率」之問題時，持一種反對「相對主義」(relativism)之立場；重申「概率」之客觀性(objectivity)。而所謂「意向性」，則是意指：當一切造成結果之因素，其條件相等時，概率亦相等；如條件不等，或另有其它因素涉入，則顯示概率上之差異。因此就一切「力」之「作用場域」而言，其交互之影響，出現具有「意向性」之概率。交互影響之因素產生變化，無論屬於單一因素之內部，或諸多因素之互動，「意向性」之概率，亦隨之調整。此一事實，說明概率之客觀性。²⁶

波普爾之論，就其所欲建構之「宇宙構成論」而言，此一概念之提出，主要意在將「變化」中所涉及之「必然性」與「或然性」，予以定位；以支撐知識之「有效理論」。故就其所謂「意向性」之概率理論而言，並不涉及「因素」之內部，而僅能及於「作用場域」中之規律。故以「自然哲學」(natural philosophy)與「形而上學」(metaphysics)之切割而論，未必即能因此排除「宗教」中之神學理論，乃至「觀念論」哲學之可能；如波普爾所期待。然依其所陳述，並以之結合於現代物理之概念與理論，至少已將「目的性」(finality)之概念，大幅限縮於「作用因素」之內部；並以此排除由「概括性思惟」所產生之「臆想中之決定論」。波普爾之主張「開放

²⁵ 參註 19。

²⁶ 關於「概率之趨向性詮釋」(the propensity interpretation of probability)之論述，參見 Karl Popper, *The World of Parmenides: Essays on the Presocratic Enlightenment*, edited by Arne F. Peterse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Jørgen Mej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中文改編波普爾文集《通過知識獲得解放》續集，〔英〕波普爾 Karl Popper 撰，李本正 Li Benzheng、范景中 Fan Jingzhong 編譯：《走向進化的知識論》*Zouxiang jinhua de zhishilun*（杭州[Hangzhou]：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Zhongguo meishu xueyuan chubanshe]，2001年）。

性之社會」(open society)，乃至極力否定一切根源於「歷史主義」(historicism)之「決定論」觀點，即是依此而延伸。²⁷

倘若由此而回顧社會與歷史，歷史之偶然性，存在於人之「意志力」，與作為「歷史舞臺」之宇宙之「或然性」間，不確定之關係。因此，由「偶然性」中推導出「形勢之演進」，牽涉「社會」構成之機制；社會學之原理由是產生。然一種「事後」之說明，如無「關連」之嚴格證明，並不能真正解釋「事實」(fact)與「真理」(truth)間之關係。因而歷史之預測，不僅允許錯誤之空間；且據「方法論」(methodology)之意義言，歷史之持續研究，亦不能如科學般，必然產生「知識進步」之演化。故就此而言，已超越波普爾討論之範圍。

唯史學可以試圖達至一種「合理之評估」，即是：於各種可能影響社會發展之因素間，依時段，尋找出不同之「可能之趨向性」；而不以既有之歷史考掘，認定任何一項因素具有絕對之支配力。²⁸

以此而言，任何一種「定論式」或「理想性」之歷史預測，無論其建構詮釋之過程中所可能符合之「歷史樣本」為何，皆不可能為真。對於歷史之分期，亦無一種先驗之原理，潛藏於背後。歷史之相似性，與「可類比性」，對於歷史研究而言，皆止應是歷史研究之課題，而非建構普遍理論之基礎與明證。「社會學理論」之於史學，其有效性，於此觀點下，雖非必然遭排斥，固將受到極大之約限。

然如依此推論，所謂「構成歷史延續性之主體」之概念，豈非亦絕無成立之可能？事又不然。首先當分辨者，為以「歷史」而言之「主體」概念。

基本而言，歷史除以社會組成之形式與功能，為其發展之主體外，並無此外之主體；因而歷史之主體，若有，即是社會之實體。然一種以「文明之延續性」作為「歷史脈絡」之敘述，卻可能涵蓋不同之社會實體。因而若以「文明之延續」，作為歷史所具有之相應之「主體」，即可能產生此一「主體」是否來自「詮釋中之虛構」之質疑。

²⁷ 至於其所主張之「開放之宇宙」(參見 Karl Popper, *The Open Universe: An Argument for Indeterminism From the Postscript to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New York, NY: Routledge, 1988)，則與此不必然有連帶之關係(亦即「開放宇宙」與「開放社會」之論，二者不必然相互支撐)。

²⁸ 於此方法之運用中，「概率趨向性」中所存在之機率之不確定性，與造成「趨向性概率」改變之因素組合之非必然性，皆使任何「定論式」之「歷史發展說」，於理論成為不可能；無論此「定論主義」之根源為何。

如「中國史」建立之初，太史公之作《史記》，以「天下」之觀念，涵蓋「五帝」以下為天下之統紀者，以迄於其當身所處之漢武帝朝，即是一種「歷史詮釋」；故自謂乃「成一家之言」。其書並非一國、一族之史記。因而太史公亦無「社會實體」之「延續性」概念。自《漢書》變太史公之書，斷代為史，而後太史公所以為「通史」之義，因之而微。至宋，司馬君實作《資治通鑑》，起周威烈三家分晉之年，以迄五代末後周之世宗，然後以「中國」作為「文明延續之表現形式」之一種「文明主義」（而非「民族主義」〔nationalism〕）之「中國史」觀，始正式具體化。²⁹

對於此種歷史觀而言，以共同之「語言」、「文字」與「歷史記憶」為基礎之漢語民族，及其所維繫之社會，雖係「中國文明」與「中國治統觀」之基礎；「中國文明」中所內涵之「價值性之召喚力量」，方是其足以歷經分裂而能重整，並不斷擴大其同化力量之根本。故《通鑑》一書，以「周天子承認三家分晉」一事之可慨嘆，作為其秉筆之託始。

然以歷史之發展而言，此種「價值觀」，如僅是以「理念」(idea)之方式擴展，亦可能僅是造成一種擴散式之「泛文化形態」影響；而非持續以「國家」作為凝聚社會之方式。故一種「民族主義」式之「民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之崛起，對於中國於中古帝國崩潰後之國家建構，有其「雖非迫切卻終極應有」之需求。特此「民族意識」之崛起，對中國而言，非因反抗壓迫而起，而係因「須鞏固自身」之危機感而興；而其精神建設，則來自一種高度哲學化與道德化之儒學運動。此即隋唐五代後，所逐漸發展之兩宋理學。而晚明所出現之強烈之具有現代意義之「民族主義」，即是其結果。

而以明、清史之相續論，雖以結果觀察，中國為外族入侵，並接受統治，為事實，然即使入主中國之滿族，亦於其統治之舉措，部分順應中國之體制，並接受「中國」之文明觀念，將自身納入於「中國」之概念中；此亦是事實。清代之詔修《明史》與《四庫全書》，即是此一觀念之實踐。

以上所敘之轉折，顯示「中國史」之建構，有其虛擬之部分，亦有其真實之部分；而於其過程中，中國社會所形塑之「文明意識」與「歷史意識」，對於中國之成為中國，發揮極重要之影響力。因而如以歷史之綿延論，

²⁹ 參見拙作〈中國近二百年「存在思惟」中世界觀之轉變與其時代意義〉“Zhongguo jin erbainian ‘cunzai siwei’ zhong shijieguan zhi zhuanbian yu qi shidai yiyi”，收入戴景賢 Tai Ching-hsien：《中國現代學術思想史論集》Zhongguo xiandai xueshu sixiang shi lunji。

其所綿延者，其實乃是一種「文明」，而非一種「社會之特殊性」；「社會之特殊性」，僅是「文明理念」與「社會現實變化」雙重影響下，階段性之結果。

以此意義而言，若於歷史之脈絡中，出現延續性之發展脈絡，社會之作為「實體」之結構性因素，與超越「社會結構」意義而出現於「個人」之思想性與精神性特質，皆可能為社會之「作用力」場域中，塑造出「意向性」形勢之因素。依此而論，歷史於特定情況下，聲稱其演變來自一具有延續性之主體，亦非不能。

四、現代中國史研究之「中國史」意義

如前所言，社會之文化發展，可能來自社會主體、國家主體，亦可能來自具有延續性之「歷史主體」。此一「歷史主體」，若謂存在於任何時段、任何社會，為社會延續之當然結果，此固不然。然如社會之凝聚，來自社會成員對於該社會所累積而有之「歷史記憶」、「生活方式」、「價值理念」或「宗教信仰」之高度認同，則可能使此項牽涉「個人心理」與「集體意識」之因素，與其所連帶產生之其它因素結合，發揮複合之作用力；從而影響與社會發展相關之「概率之趨向性」。此事則屬可能。若然，則歷史本身，將考驗此種造成「社會凝聚」之認同方式，是否足以延續，且成為維繫此一社會之關鍵因素。

至於此所指涉之「文化認同」與「歷史認同」，如何發生？如何擴散？如何轉化？如何消失？其所牽涉之心理因素為何？則是一極為複雜之問題；其本身，即成為一需各學科分別加以研究之對象。

今若進一層依此為分析，則對於經歷帝制崩潰，以至社會重整之現代中國而言，所謂「中國史之新研究」，即可存在另一重不同於「世界史意義」之「中國史意義」。³⁰此一重意義之發生，源自前文所敘及中國長久以來，本已存在之「文明意識」與「歷史意識」，乃至其在「現代」之延續。而其展現之方式，則是將中國史研究之「詮釋結果」，與其成員自身之「現代意

³⁰ 此處所指言「歷史意義」之雙重性，與布萊德雷所謂歷史係結合「作為時間中之事件」之「客觀」意義，與「作為人心靈中之回憶」之「主觀」意義之論法，非屬一事。布萊德雷之說，參見 Francis Herbert Bradley (1846-1924), *The Presuppositions of Critical History*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8, p.11；中譯本，〔英〕F. H. 布萊德雷 F.H. Bradley 撰，何兆武 He Zhaowu、張麗豔 Zhang Liyan 譯：《批評歷史學的前提假設》*Piping lishixue de qianti jiashe* (北京[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07年)，頁11。

識」(modern consciousness)相結合，由是產生以「中國之未來」作為自身「『存在』想望」之目標；並由此堅定其行動之意志。

此種連結之複雜處，在於意識中屬於「現在」(the present)之因素與屬於「過去」(the past)之因素之相互滲透與糾結；以及其所作用於個人心理之方式。環繞於「過去」之記憶，對於中國現代之「智識心靈」而言，乃一既期待割裂，又不欲拋捨之「自我」(self)；於此反映出一種似虛擬而又似真實之「歷史感」。

此種複雜之心理，對於不熟悉「中國思想史」之學者或評論者而言，極易將之詮釋為：其來源，僅是出於亞洲民族遭受「資本主義式帝國主義」(capitalist imperialism)勢力侵擾、衝擊下所產生之「現代民族主義」(modern nationalism)；而其所帶動之影響，則止是一種「價值觀」之普遍作用。³¹

以上兩說之主要差異，在於：中國長久以來，即已存在之「文明意識」與「歷史意識」，不僅有一延續之社會共同體，予以支撐；且此意識之來源，乃出自世界各文明中少有之極為豐富之文獻史料與思想性、文學性著作，因而於其所產生之「思想導引」之作用上，與一般性之「民族主義」，乃至寬泛義之「文化影響」不同。此一思想之導引作用，具有三項可予分析之特質：

首先在於：賦予一切「社會想像」(social imagination)以「歷史」之向度。

此一說法，並非單純意指「思惟者」於所有之社會學議題，皆試圖以「歷史社會學」之方式，予以深化；而係指其運用「社會學思惟」以建構「社會想像」時之一種思惟方式之增添。

蓋就「社會學」論述而言，有一必要之背景場域，即是一種屬於靜態之「社會設置」(social setting)與「社會脈絡」(social context)之概念；即使於分析論者所自持之觀點之轉變時，亦是於「靜」中觀「動」。然如思

³¹ 關於經濟發展中「文化」作用之個案與類型性研究，參見 Lawrence E. Harrison: Samuel P. Huntington ed.,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2000；中譯本，〔美〕塞繆爾·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勞倫斯·哈里森 Lawrence E. Harrison 主編：《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Wenhua de zhongyao zuoyong: jiazhi guan ruhe yingxiang renlei jinbu* (北京[Beijing]: 新華出版社[Xinhua chubanshe], 2002年)。

惟者本身，受其歷史詮釋觀點之豐富性與不確定性之影響，而產生動態之移動，則其所發展之「社會想像」，即可能因此一「歷史向度」之加入，而成為動態。中國現代思惟中之「革命意識」之持續成為動態，即是此種「現實」與「歷史」混合之產物。

其次在於：「個人價值觀」之融入於「集體意識」(conscience collective/collective conscious)。

「個人」與「群體」之關係，對於中國之傳統思惟而言，涉及「社會之整體性」與「人倫之分殊性」兩項概念；道德之個體性、私人性與義務性，政治之「無可逃避性」，與政治網絡中屬於個人之「選擇性」等種種理念，因此獲得強化。

所謂「社會之整體性」與「人倫之分殊性」之概念，就前者言，反映人類於期待分享「存有價值」時之存在想像，及所謂「共同福祉」之觀念；就後者而言，即是人以其情感之自然狀態所延伸之相對義務，定位「個體」與其它「個人」間之關係。

至於所謂「道德之個人性、私人性與義務性」之理念，就「個人性、私人性」而言，即是主張真實之道德，係來自個體之「自由」、「自身」與「自覺」；不涉及強迫性之規範。而所謂「政治之無可逃避性與政治網絡中屬於個人之選擇性」之理念，則是強調人之「道德性義務承擔」，雖於原則上，普遍存在於所有生活領域，然作為精神生活中之獨立個體，則應擁有不受侵犯之私人空間。以上各項，構成中國士人之「世間」概念，及所謂「處世之道」之價值信仰。

唯對於現代之中國智識份子而言，傳統以來之「自然中之人」(man in Nature)之「人性」觀，為「社會中之人」(man in society)之「共命」觀所取代。於是遂使價值思惟由「性」轉向於「命」；個人所原本擁有之道德空間，大幅受到約限。個人價值觀中之「自由義務」，於社會運動、政治運動之影響下，開始轉化成為集體意識中之「集體使命」。

第三項，則是：一面藉「歷史批判」以切割「古」、「今」；一面藉歷史主體之「延續性」概念，以重新建構自身之新的「主體」，並以「主體發展」之自我認知，作為詮釋「當前現實」之方向性之基礎。

此一思惟之具體化，最為明顯之呈現方式，即是於政治語言中持續傳達之一種具有「集體性道德」義涵之「意識形態」之宣示，及以新的「主

體意識」為主軸之「現代史論述」。「現代史」之於中國，開始成為一種具有普遍影響力之新的「歷史意識」。

四、作為「國家未來」之中國與作為「文明未來」之中國

歷史詮釋於中國史研究所展現之「雙重性」，一方面顯示「歷史研究」之客觀性與主觀性，其相互間之關連，並非於任一詮釋者之詮釋中，皆屬一致。「批判史學」之成為可操作之方法，亦必須兼及「歷史詮釋學」之分析。³²因此史學議題與史學論述，亦無法執一端以盡其餘。

對於延續「世界史議題」之「中國研究」而言，中國史之無法以比擬於「直生論」之「演化說」，³³或「唯物史觀」之「五階段論」，³⁴加以充分詮釋，而仍可大致適用「三階段式」之分法，顯示人類文明之發展，於不同階段、不同情境，存在不同類型之「優勢因素」；歷史研究有可會通，而無從演繹。中國於現代之轉型，受惠、得益於「世界史」視野之援入；然亦於同時，因歷史詮釋之不能皆當，與自身歷史意識之糾結，使其於發展之過程中，無法達至高度文明社會所應有之「均衡」與「清明」。以是中國之未來，猶是憂、喜參半。而有關其前景之判斷與解析，則可分為「國家未來」與「文明未來」兩端，加以論述：

以「國家前途」而言，中國經歷「現代化」之轉折，重構其「國家」體制，並於其間鞏固其本有之「民族」意識，並轉化其所得自於歷史之「文明意識」與「歷史意識」，使「國家」成為一種「信仰」；以此而言，此一「俗世性」之價值觀點，雖非於任何思想之場域，皆凌駕於一切關涉「理念」之信仰，卻仍將成為其解決紛爭，與決定國家發展方向與目標之基點。中國重新作為「大國」之事實，與由此而產生之自信，將使其業已形成之「現代意識」，延伸、擴展成為一種「未來意識」。中國並無懼於以此姿態，將自身投入於世界未來之競爭環境中。而中國厚積於過往文化與現代經驗之「治術思惟」與「戰略思惟」，亦仍將延續於未來。中國即將真正成為世界之強權。

³² 布萊德雷曾謂歷史之「客觀」意義，與其「主觀」意義，係自然結合為一體；其論中未分辨「詮釋者」立場之差異。布萊德雷之說，參見 Francis Herbert Bradley, *The Presuppositions of Critical History*, p.11；中譯本，〔英〕F. H. 布萊德雷 F.H. Bradley 撰，何兆武 He Zhaowu、張麗豔 Zhang Liyan 譯：《批評歷史學的前提假設》*Piping lishixue de qiantijiashe*，頁 11。參註 30。

³³ 比擬於「直生論」之「演化」說，參註 11。

³⁴ 參註 9

唯對於中國而言，維持一歷史經驗所總結之「高而不亢」之自足方式，仍是其最高原則；故亦不致將自身驅迫成為一「帝國主義」式之發展形態。中國以「政治思惟」之角度，取汲於其歷史經驗，將於未來成為其歷史研究中之要項。

唯以「文明前途」而言，中國之於現代，以一種「停滯論」之觀點，批判其所指稱於中國傳統社會之「結構之封建性」與「思想之闇昧性」；並以頗為粗糙之方式，解讀一切與「價值論述」相關之文獻語料。此一發展，雖就其觀念之成習而言，仍於「故舊」有所承襲；然僅存框架而失其內蘊，不免使中國積累之文化創造力，逐漸減弱。未能因於社會之轉型，使其精義，亦能適應、結合於現代之文明形式，從而有所發揮。於此狀況下，層累、混雜之思想因素，反將使中國龐大之社會，面對未來社會動力不斷增長時，不斷出現思想之紛爭，且難於止息。其中「個人」與「社會」間相互關係之議題糾葛，即是一項。於此形勢下，中國為取得「治理正當性」基礎之穩固，逐步將「現代」與「古代」之切割弭平，以深化其所業已建構之「歷史主體觀」，蓋為一可能之方向。

然「文明」之創造，不僅需條件之培養，包括語文、歷史、思想之教育；亦需社會給予發展之空間，使具有創造力之個人，能以其精神之自由，³⁵

³⁵ 所謂「自由」(freedom)，若依康德之說，有所謂「先驗之自由」(transcendental freedom)與「實踐之自由」(practical freedom)之分；而後者乃以前者為基礎（關於康德之「自由」理論，參見 Henry E. Allison, *Kant's Theory of Freedo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中譯本，〔美〕亨利·阿利森 Henry E. Allison 撰，陳虎平 Chen Huping 譯：《康德的自由理論》*Kangde de ziyou lilun*〔瀋陽[Shenyang]：遼寧教育出版社[Liaoning jiaoyu chubanshe]，2001 年〕）。就中國儒、釋、道三家而言，則其說之於康德，有近、有不近：儒、道二家之「自由」論，於「先驗」之部分，主要建構於所謂「心體」之說。道家以「滌除玄覽」之可經由破「有」而證「無」，說明「心體自由」之本然，與其所以然之根源；以此成就其「生而不有」、「為而不恃」之「無為」。儒家則以「致中和」之可能，說明「心」之所以統合「性」、「情」；以此成就其「誠、明一體」之說。至於佛教，則以人性為「淨」、「染」之和合，必染性盡去，然後可以轉「識」成「智」，得大自在；其心體之說，又有不同。大體而論，儒、道、釋三家於此一方面之論點，雖涉入康德所未涉入之領域（即「性體」之本有，與「法身」之清淨），然於性質上，東、西方論點，仍於哲學之論述，有可對話之論題。至於「自由」之「實踐」義部分，則因康德所主張之「理性行為能力」與「意志自律」之概念，皆是建立於「理性之意志活動」之概念之上，因此必落實於「無上命令」對於「符合法則」之要求。此一立場，若依佛家之論義言，「無分別智」不依作用見有，「俗諦」則出於方便，以是與康德之論，相去甚遠；可置不論。至於儒、道，由於二家皆係於「動」義中釋「靜」，故亦康德之論與其思惟方式所未見。且依二家之現實主張而言，道家之反對「常勢」、「常形」，固是於根本處，阻絕

探索價值之可能；而非僅是協助完成「政治穩定」之發展目標。故中國如何於未來，依憑以「國家」與「社會」為基礎之中國，完成作為「文明形態」之中國，仍存在極為艱困之難題，需要面對與克服。

【責任編校：李宛芝、蔡嘉華】

「忠信」與「禮義」之關連；即如儒家之重名教，亦主須達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境，乃可由覺者「心之所向」顯見其符於「大公」、「順應」之極則。雙方之差異亦大。故「自由」之於「實踐」呈義，對於中國儒、道相融之「世間見解」而言，既不當一意「偏仁」，亦不當一方「偏智」，「仁」、「智」不忤而俱在一念之中。至於人之由「行義」或「順命」而若顯現為「應為、當有」之「義務性」，則皆僅在「圓滿自我」；所謂「盡命」。故以儒家之汲汲於經世，亦不將此等屬於「個人」之存在價值與存在尊嚴問題，延伸於維護社會之「法理」，從而形成「法理學」(jurisprudence)中有關「正義」(justice)與「人權平等保障」(equ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之觀點。就此點論，如何於中國傳統以及現代之思惟中，深掘此一延伸論域所以欠缺不足之原由，予以彌補，並以具體之實踐，貫徹於社會之改造，實為中國持續「現代化」之過程中，一不可忽略之事。

主要參考書目

- 卜正民 Timothy Brook：〈資本主義與中國的現代歷史書寫〉“Ziben zhuyi yu zhongguo de xiandai lishi shuxie”，收入卜正民 Timothy Brook、格力高利·布魯 Gregory Blue 主編，古偉瀛 Gu Weiyong 等譯：《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Zhongguo yu lishi ziben zhuyi*，北京 Beijing：新星出版社 Xinxing chubanshe，2005 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Zhongguo shehui kexue yuan lishi yanjiu suo、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Zhongguo shehui kexue yuan jingji yanjiu suo、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歷史研究》編輯部 Zhongguo shehui kexue zazhi she *Lishi yanjiu bianji bu* 合編：《封建名實問題討論文集》*Fengjian mingshi wenti taolun wenji*，南京 Nanjing：江蘇人民出版社 Jiangsu renmin chubanshe，2008 年。
- 王弼 Wang Bi：〈周易略例〉“Zhouyi lueli”，收入王弼 Wang Bi 撰，樓宇烈 Lou Yulie 校釋：《王弼集校釋》*Wang bi ji xiao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下冊，2009 年。
- 王德威 Wang Derwei：《眾聲喧嘩》*Zhong sheng xuanhua*，臺北 Taipei：遠流出版 Yuanliu chuban，1988 年。
- 王德威 Wang Derwei 撰，宋偉杰 Song Weijie 譯：《現代性的壓抑：晚清小說新論》*Xiandaixing de yayi: wanqing xiaoshuo xinlun*，臺北 Taipei：麥田出版 Maitian chuban，2003 年。
- 史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 撰，陳曉林 Chen Xiaolin 譯：《西方的沒落》*Xifang de moluo*，臺北 Taipei：遠流出版 Yuanliu chuban，2000 年，據 1962 年單冊節本譯。
- 司馬光 Sima Guang 編撰：《資治通鑑》*Zizhi tongjian*（新校本），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56 年。
- 司馬遷 Sima Qian：〈報任少卿書〉“Bao renshaoqing shu”，見班固 Ban Gu 撰，顏師古 Yan Shigu 注：《漢書》*Han 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第 9 冊，1962 年；亦見蕭統 Xiao Tong 編，李善 Li Shan 注：《文選》*Wen xu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第 5 冊，1986 年。

- 司馬遷 Sima Qian 撰，司馬貞 Sima Zhen 索隱，張守節 Zhang Shoujie 正義：
《史記》*Shi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2 年。
- 布洛赫 Marc Léopold Benjamin Bloch 撰，張緒山 Zhang Xushan、李增洪 Li
Zenghong、侯樹棟 Hou Shudong 等譯：《封建社會》*Fengjian shehui*，
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 guan，2012 年 4 刷。
- 布萊德雷 F.H. Bradley 撰，何兆武 He Zhaowu、張麗豔 Zhang Liyan 譯：《批
評歷史學的前提假設》*Piping lishixue de qianti jiashe*，北京 Beijing：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07 年。
- 艾思奇 Ai Siqi 主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Bianzheng weiwu zhuyi
lishi weiwu zhuyi*，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Renmin chubanshe，1961 年。
- 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勞倫斯·哈里森 Lawrence E. Harrison 主編：
《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Wenhua de zhongyao
zuoyong: jiazhi guan ruhe yingxiang renlei jinbu*，北京 Beijing：新華出版
社 Xinhua chubanshe，2002 年。
- 伯克 Peter Burk 撰，姚朋 Yao Peng、周玉鵬 Zhou Yupeng 譯，劉北成 Liu
Beicheng 校：《歷史學與社會理論》*Lishixue yu shehui lilun*，上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2001 年。
- 伯恩斯 Robert M. Burns、皮卡德 Hugh Rayment-Pickard 輯，張羽佳 Zhang
yujia 譯：《歷史哲學：從啟蒙到後現代性》*Lshi zhexue :cong qimeng dao
xiandai*，北京 Beijing：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Beiji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08 年。
- 余英時 Yu Yingshi：《土與中國文化》*Shi yu zhongguo wenhua* (1987)，上
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2013 年第
2 版。
- ：《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Zhongguo zhishiren zhi shi de kaocha*，桂
林 Guilin：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04 年。
- 李孝遷 Li Xiaoqian：《西方史學在中國的傳播(1882-1949)》*Xifang shixue zai
zhongguo de chuanbo* (1882-1949)，上海 Shanghai：華東師範大學出版
社 Huad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2007 年。
- 李勇 Li Yong：〈「中國社會史論戰」對於唯物史觀的傳播〉“Zhongguo shehui
shi lunzhan dui yu weiwu shiguan de chuanbo”，《史學月刊》*Shixue
yuekan* 2004 年第 12 期。

- 李歐梵 Lee Oufan:《現代性的追求:李歐梵文化評論精選集》*Xiandaixing de zhuiqiu: Li Oufan wenhua pinglun jingxuan ji*, 臺北 Taipei: 麥田出版公司 Maitian chuban gongsi, 1996 年。
- 杜運輝 Du Yunhui:《侯外廬先生學譜》*Hou Wailu xiansheng xuepu*, 北京 Beijing: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13 年。
- 波普爾 Karl Popper 撰, 李本正 Li Benzhen、范景中 Fan Jingzhong 編譯:《走向進化的知識論》*Zouxiang jinhua de zhishilun*, 杭州 Hangzhou: 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 Zhongguo meishu xueyuan chubanshe, 2001 年。
- 波普爾 Karl Popper 撰, 李豐斌 Li Fengbin 譯:《歷史定論主義的窮困》*Lishi dinglun zhuyi de qiongkun*, 臺北 Taipei: 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 1981 年。
- 波普爾 Karl Popper 撰, 何林 He Lin、趙平 Zhao Pin 譯:《歷史主義貧困論》*Lishi zhuyi pinkun lun*, 北京 Beijing: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1998 年。
- 阿利森 Henry E. Allison 撰, 陳虎平 Chen Huping 譯:《康德的自由理論》*Kangde de ziyou lilun*, 瀋陽 Shenyang: 遼寧教育出版社 Liaoning jiaoyu chubanshe, 2001 年。
- 侯外廬 Hou Wailu 撰, 杜國庠 Du Guoxiang 校閱, 中國學術研究所 Zhongguo xueshu yanjiusuo 編輯:《中國古代社會史》*Zhongguo gudai shehuishi*, 上海 Shanghai: 新知書店 Xinzhi shudian, 1948 年。
- 侯外廬 Hou Wailu 撰:《中國古典社會史論》*Zhongguo gudian shehuishi lun* (1941), 重慶 Zhongqing: 五十年代出版社 Wushi niandai chubanshe, 1943 年。
- 柯林烏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撰, 陳明福 Chen Mingfu 譯:《歷史的理念》*Lishi de linian*, 臺北 Taipei: 桂冠圖書公司 Guiguan tushu gongsi, 1992 年。
- 馬扎亞爾 L. Madyar 撰, 陳代青 Chen Daiqing、彭桂秋 Peng Guiqiu 譯:《中國農村經濟研究》*Zhongguo nongcun jingji yanjiu*, 上海 Shanghai: 神州國光社 Shenzhou guoguang she, 1930 年。
- 梁啟超 Liang Qichao:《新史學》*Xinshixue*, 編為《飲冰室文集之九》*Yinbingshi wenji zhiji*, 收入梁啟超 Liang Qichao 撰:《飲冰室合集》*Yinbingshi*

- he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03 年重印本 4 刷, 第 1 冊。
- 斯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 撰, 吳瓊 Wu Qiong 譯:《西方的沒落》*Xifang de moluo* (全 2 卷), 上海 Shanghai: 上海三聯書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2006 年。
- 斯賓賽 Herbert Spencer 撰, 嚴復 Yan Fu 譯:《群學肄言》*Qunxue yiyen*, 北京 Beijing: 商務印書館 Shangwu yinshu guan, 1981 年。
- 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撰, 王造時 Wang Zaoshi 譯:《歷史哲學》*Lishi zhexue*, 上海 Shanghai: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shudian chubanshe, 2006 年。
- 鄭家建 Zheng Jiajian:《中國文學現代性的起源語境》*Zhongguo wenxue xiandaixing de qiyuan yujing*, 上海 Shanghai: 上海三聯書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2002 年。
- 魯之凡 Lu zhifan:《東方專制論: 亞細亞生產模式研究》*Dongfang zhuanzhi lun: yaxiya shengchan moshi yanjiu*, 臺北 Taipei: 南方叢書出版社 Nanfang congshu chubanshe, 1987 年再版。
- 錢穆 Qian Mu:《文化學大義》*Wenhua xue dayi*, 收入錢穆 Qian mu 撰,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Qian Binsi xiansheng quanji bianji weiyuanhui 主編:《錢賓四先生全集》*Qian Binsi xiansheng quanji*, 臺北 Taipei: 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 1998 年, 第 37 冊。
- :《民族與文化》*Minzu yu wenhua*, 收入錢穆 Qian mu 撰,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Qian Binsi xiansheng quanji bianji weiyuanhui 主編:《錢賓四先生全集》*Qian Binsi xiansheng quanji*, 第 37 冊。
- :《國史新論》*Guoshi xinlun*, 收入錢穆 Qian mu 撰,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Qian Binsi xiansheng quanji bianji weiyuanhui 主編:《錢賓四先生全集》*Qian Binsi xiansheng quanji*, 第 30 冊。
- 戴景賢 Tai Chingsien:〈中國現代學術之形成與其發展脈絡〉“Zhongguo xiandai xueshu zhi xingcheng yu qi fazhan moluo”, 收入戴景賢 Tai Chingsien:《中國現代學術思想史論集》*Zhongguo xiandai xueshu sixiang shi lunji*, 香港 Hongkong: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2014 年, 排印中。

- ：〈中國近二百年「存在思惟」中世界觀之轉變與其時代意義〉“Zhongguo jin erbainian ‘cunzai siwei’ zhong shijieguan zhi zhuanbian yu qi shidai yiyi”，收入戴景賢 Tai Chinghsien：《中國現代學術思想史論集》*Zhongguo xiandai xueshu sixiang shi lunji*。
- ：〈論錢賓四先生「中國文化特質」說之形成與其內涵〉“Lun Qian Binsi xiansheng ‘zhongguo wenhua tezhi’ shuo zhi xingcheng yu qi neihan”，收於戴景賢 Tai Chinghsien：《錢賓四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Qian Binsi xiansheng yu xiandai zhongguo xueshu*。
- ：〈錢賓四先生有關歷史與人性之理解及其學術意義〉“Qian Binsi xiansheng you guan lishi yu renxing zhi lijie ji qi xueshu yiyi”，收於戴景賢 Tai Chinghsien：《錢賓四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Qian Binsi xiansheng yu xiandai zhongguo xueshu*。
- ：〈錢賓四先生所關注之時代問題與其學術取徑〉“Qian Binsi xiansheng suo guanzhu zhi shidai wenti yu qi xueshu qujing”，收於戴景賢 Tai Chinghsien：《錢賓四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Qian Binsi xiansheng yu xiandai zhongguo xueshu*。
- ：〈錢賓四先生研究歷史之角度與其建構史觀之過程及方式〉“Qian Binsi xiansheng yanjiu lishi zhi jiaodu yu qi jiangou shiguan zhi guocheng ji fangshi”，收於戴景賢 Tai Chinghsien：《錢賓四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Qian Binsi xiansheng yu xiandai zhongguo xueshu*。
- ：《中國學術概念產生之歷史時刻與其條件》*Zhongguo xueshu gainian chansheng zhi lishi shikey u qi tiaojian*，待刊。
- Allison, Henry E, *Kant's Theory of Freedo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Bloch, Marc Léopold Benjamin, *La Société Féodale*, two volumes, translated by L.A. Manyon, *Feudal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 Bradley, Francis Herbert, *The Presuppositions of Critical History*.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8.
- Burk, Peter,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1993), 2nd ed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 ,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89*. St. Redwood City,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Burns, Robert M, and Hugh Rayment-Pickard eds., *Philosophies of History: From Enlightenment to Post-Modernity*.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0.
- Collingwood, Robin George,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 Harrison, Lawrence E, Samuel P. Huntington ed., *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2000.
-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introduction, reason in history*,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edition of Johannes Hoffmeister from Hegel papers assembled by H. B. Nisbet.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 Lee, Leo Ou-fan,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Moser, Paul K, *Philosophy after Objectivity*.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1993.
- Popper, Karl Raimund,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7.
- , *The Open Universe: An Argument for Indeterminism From the Postscript to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New York, NY: Routledge, 1988.
- , *The World of Parmenides: Essays on the Presocratic Enlightenment*, edited by Arne F. Peterse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Jørgen Mej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Spencer, Herbert, *The Study of Sociology*.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1.
- Spengler, Oswald,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Umriss einer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 (1918-1922) ;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2 vols., authorized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 by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32.
- Stalin, Joseph V, *Dialect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ublished in 1938.
- Wang, Der-wei, *Fin-de-Sie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審查意見摘要

第一位審查人：

本文為最近台灣史學界少有之歷史理論論文，作者引用不少中外文獻，旁徵博引，且文字通順可讀，而註釋詳盡，頗值得參考。本文作者從世界史觀點指出中國現代之轉型問題，即「國家未來」與「文明未來」，「國家未來」即「國家前途」，作者指出中國從「現代化」重構「國家」體制，而其鞏固期間之「民族」意識得自歷史之「文明意識」與「歷史意識」，因而使「國家」成為一種「信仰」，中國將來成為大國應無疑問，然未來走向應吸取過去歷史經驗，對未來社會動力可能出現不斷的思想紛爭，尤其「個人」與「社會」相互關係之糾葛，「現代」與「古代」之切割，因此，中國應深化業已建構之「歷史主體觀」。

第二位審查人：

反省現當代學術流變，觀察「中國史研究」之沿革發展，於史學思想史當中，梳理出相應於「世界史」、「中國史」之雙重意義，視野寬闊，脈絡深刻，具有建構「中國式」史學思想主體之宏大氣魄，以及對於「文明中國」的深刻期許，論述深有學術開展的意義。援據錢穆先生對於中國史之演進，有其自身脈絡與節奏之觀察，深入於海峽兩岸，乃至於民國以來「現代意識」下的史學建構，以及對比西方「經濟支配理論」、「社會衝突理論」的差異，條分縷析，逐一檢討，對於中國學術概念產生之反省，先後已有數篇論文，蓄積既久，遂有辨證深刻的思考。

